



香港教育大學

2019-2020 年度

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課程(五年全日制)(A5B060)

畢業論文（本科學術研究）

〈解構與後設——論董啟章小說《神》中對文學的探討與反思〉

論文指導導師：文英玲博士

學生姓名：郭曉文

繳交日期：2020 年 5 月 22 日

字數：12735 字

一、引言

《神》是香港當代本土作家董啟章近年所寫的長篇小說，於 2017 年出版，與《心》、《愛妻》合稱為「精神史三部曲」。董啟章寫此書之際，身體抱恙¹，並在雨傘運動後因寫〈必要的沉默〉而受到抨擊²。

小說分成三部分，首先是以中年情慾小說作家邢天倪作為敘述者的〈形〉、第二部分是〈影〉，是邢天倪學生余景行寫給他的信；最後的部分名〈神〉是女大學生吳幸晨的日記。

〈形〉、〈影〉、〈神〉三章，取材於陶淵明的組詩（《形影神三首》），在書的護封亦有點明：「重寫、解構陶淵明詩〈形影神〉」。在陶淵明《形影神三首》中，除序言外分三部分：〈形贈影〉、〈影答形〉與〈神釋〉，三首詩分別以形、影和神的第一人稱角度出發，藉形影神三者的對話去討論形神的概念，董啟章的《神》正正參考了此架構，而寫成一本有三個敘事觀點的小說，而當中除了邢天倪（形）、余景行（影）、吳幸晨（神）三個敘事者外，還有許多推動情節發展的人物，如積極推動香港本土文學的大學教授忽滑谷、參與社運而喪失其他人生意義的大學生罔兩、教授邢天倪陶潛與莊子的中文系教授任真先等等。

二、文獻回顧

前人對董啟章作品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幾個方向：

1. 城市與歷史書寫：探索香港「身份」的問題

陳孟君的〈地圖、神話與（偽）考古人類學：論董啟章小說想像城市歷史的路徑〉³、翁婉君的〈董啟章的城市創作觀與書寫實踐〉⁴、洛楓的〈歷史想像與文化身份的建構——論西西的《飛氹》

¹ 「董亦透露他二〇一四年尾患上焦慮症，即使吃藥、針灸情況也未見好轉，而寫作也未見得是一個情緒的出口。」「回想當初塑造『獨裁者』這個角色，董沒想過日後會沾上他的氣息：『當時我寫的時候，身體尚算健康，並沒有患病。可是，隨著年齡增長，我開始體會到寫作是一件傷害精神的活動，加上近年的政治氣氛對我個人有很大衝擊，便逐漸實際地上演了獨裁者『以時代的病徵自許』的劇場。』」引柯文君：〈董啟章：今次寫科幻小說(16:00)〉，《明報文學版》，2018年7月8日。

² 「採訪者吳廣泰：我記得二零一四年的時候，你作為書展年度作家，提到必要的沉默，曾牽起了關於沉默的討論……董啟章：很多人不同意我說沉默，覺得我叫人不要發聲，其實我不是這個意思。那篇我在說作為一個公民應該表達，不過文學應有獨特的位置，就是未必應直接即時介入當下的政治，文學與之存在距離，或者沉默的地方，就是不直接配合運動做事，而我說的沉默就是給予文學這個空間。」引吳美筠：〈後反送中時期，香港人的語言怎樣走下去 ——董啟章訪談錄（上）〉，《香港文學評論》，載於 <https://www.literaturehk.com/920931040143/2019/7/16/>。

³ 陳孟君：〈地圖、神話與（偽）考古人類學：論董啟章小說想像城市歷史的路徑〉，《臺大中文學報》，第 48 期

（2015 年 3 月），第 161 - 214 頁。

⁴ 翁婉君：〈董啟章的城市創作觀與書寫實踐〉（國立臺灣大學文學學院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2 年）。

與董啟章的《地圖集》⁵及余麗文的〈歷史與空間——董啟章《V 城繁勝錄》的虛構技法〉⁶都分析了董啟章如何透過歷史想像去虛構一個比真實更真的城市。

鄒文律的《城市書寫：董啟章小說研究》⁷及陳婉秋的〈歷史重構，身份追尋——論董啟章《地圖集》與《V 城繁勝錄》體現的香港本土意識〉⁸則分析董啟章如何以小說建構「香港文化身份」。

鄒文律的〈人與物件的時光之旅——論董啟章《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的物（家）史書寫〉⁹、許維賢的〈黑騎士的戀物／（歷史）唯物癖：董啟章論〉¹⁰、廖偉棠的〈從拜物者的烏托邦走向可能世界——評董啟章長篇小說《天工開物·栩栩如真》〉¹¹及王貽興的〈物先腐而後蟲生，還是置之死地而後生？——讀董啟章的《衣魚簡史》〉¹²都是分析董啟章如何透過物件去追溯、想像城市歷史。

2. 性別議題：對女性意識的追求／建構；身體書寫

董啟章主要關於性別議題的主要有兩本：《安卓珍尼》和《雙身》。張娟芬的〈與男同志錯身：評董啟章《雙身》〉¹³、梅家玲的〈閱讀安卓珍尼——雌雄同體／女同志／語言建構〉¹⁴及黃雅婷的〈論董啟章《雙身》及《體育時期》的身體書寫〉¹⁵分析董啟章小說中的身體書寫，特別是雌雄共體、錯身一類。

⁵ 洛楓：〈歷史想像與文化身份的建構——論西西的《飛氈》與董啟章的《地圖集》〉，《素葉文學》，第 68 期（2002 年 12 月），第 57 - 59 頁。

⁶ 余麗文：〈歷史與空間——董啟章《V 城繁勝錄》的虛構技法〉，見黎活仁編：《方法論與中國小說研究》（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0 年），第 427 - 444 頁。

⁷ 鄒文律：《城市書寫：董啟章小說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課程哲學碩士論文，2006 年）。

⁸ 陳婉秋：〈歷史重構，身份追尋——論董啟章《地圖集》與《V 城繁勝錄》體現的香港本土意識〉（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專題研究》論文，2002 年）。

⁹ 鄒文律：〈人與物件的時光之旅——論董啟章《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的物（家）史書寫〉，《政大中文學報》，第 16 期（2011 年 12 月），第 231 - 268 頁。

¹⁰ 許維賢：〈黑騎士的戀物／（歷史）唯物癖：董啟章論〉，《香港浸會大學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第 64 期（2007 年 6 月）。

¹¹ 廖偉棠：〈從拜物者的烏托邦走向可能世界——評董啟章長篇小說《天工開物·栩栩如真》〉，《香港文學》，第 258 期（2006 年 6 月），第 41 - 43 頁。

¹² 王貽興：〈物先腐而後蟲生，還是置之死地而後生？——讀董啟章的《衣魚簡史》〉，《文學世紀》，第 14 期（2002 年 5 月），第 82 - 85 頁。

¹³ 張娟芬：〈與男同志錯身：評董啟章《雙身》〉，《聯合文學》（95 年 2 月），第 128 - 133 頁。

¹⁴ 梅家玲：〈閱讀安卓珍尼——雌雄同體／女同志／語言建構〉，《性別論述與台灣小說》（台北：麥田出版，2000 年），第 249 - 276 頁。

¹⁵ 張雅雋：《尋求女性主體意識：以麥可康寧漢〈時時刻刻〉及董啟章〈安卓珍尼：一個不存在的物種的進化史〉為例》（台北：東吳大學英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張雅斐的《尋求女性主體意識：以麥可康寧漢〈時時刻刻〉及董啟章〈安卓珍妮：一個不存在的物種的進化史〉為例》¹⁶、江力麗的〈從〈安卓珍尼〉和《雙身》看董啟章對女性主題的思考〉¹⁷則分析當中的女性意識追求及女性主題的思考。

3. 校園青春小說

校園青春小說為董啟章早期的作品，包括《小冬校園》、《家課冊》、《紀念冊》。相關研究有：劉鳳鸞的〈另一個《叮噹》裡的大雄？——談董啟章《小冬校園》裡的小冬〉¹⁸、關夢南的〈讀董啟章的《家課冊》——兼說〈校園小說〉及其他〉¹⁹及黃念欣的〈另類的校園愛學——談《紀念冊》與《小冬校園》〉²⁰。

4. 後設小說／複調小說／模擬小說

陳清僑的〈模擬的姿采——淺說董啟章敘述文體的道德面向〉分析了董啟章的模擬手法。而黃彩政的〈董啟章小說敘事結構研究〉²¹

而小說《神》（2017）因為出版年份比較近，作者董啟章前後又發表了數本新書，如《心》（2016）和《愛妻》（2018），故單純對此書的討論並不多，更鮮有針對此書的學術研究，只有在網上能尋得一些文章²²及作者訪談²³中有略略提起。

然而，董啟章於2014年雨傘運動後，因發表文章〈必要的沉默〉而受到抨擊，引起他對「文學如何回應現實」這個一直思考的問題有了又一重的反思。《神》可謂是董啟章對此的回應，書中能

¹⁶ 黃雅婷：〈論董啟章《雙身》及《體育時期》的身體書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專題研究》論文，2005年）。

¹⁷ 江力麗：〈從〈安卓珍尼〉和《雙身》看董啟章對女性主題的思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本科畢業生論文，1999年）。

¹⁸ 劉鳳鸞：〈另一個《叮噹》裡的大雄？——談董啟章《小冬校園》裡的小冬〉，《滄浪》，第17／18期合刊（1996年7月），第106-109頁。

¹⁹ 關夢南：〈讀董啟章的《家課冊》——兼說〈校園小說〉及其他〉，《讀書人》，第20期（1996年10月），第50-52頁。

²⁰ 黃念欣：〈另類的校園愛學——談《紀念冊》與《小冬校園》〉，《讀書人》，第9期（1995年11月），第27-30頁。

²¹ 黃彩政：〈董啟章小說敘事結構研究〉（臺北：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6年）。

²² 丘庭傑：〈「寫不寫之寫」的可能——讀董啟章《神》〉，《香港文學》，第394期，（2017年10月），載於<http://www.hongkongliterary.com/dzdetail.jsp?id=9402&pid=34460137&dzid=50445657&nav=1>。吳芷寧：〈「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讀董啟章《神》〉，《文學香港》（2018年9月），載於<https://www.literaturehk.com/2018/2018/9/10/#>。楊焯灝：〈論董啟章《愛妻》（二之一）：淫書癖與評論人：由「葉靈鳳機器」說起〉，《SAMPLEX 微批文學媒體計劃》（2018年9月），載於<https://paratext.hk/?p=1572>。

²³ 柯文君：〈董啟章：今次寫科幻小說(16:00)〉，《明報文學版》，2018年7月8日。

顯示他對文學再三反思後的結果。在此方面卻未有太多相關研究，實在可惜。因此本文希望透過細讀及整理小說《神》，以研究董啟章——香港近年最具影響力作家之一——在創作此書時的一些想法，去了解他對文學的探討與反思。

三、正文

甲、小說對陶淵明組詩的重新解構

陶淵明組詩〈形影神三首〉	董啟章小說《神》
〈形贈影〉	〈形〉：作家邢天倪的意識敘述
〈影答形〉	〈影〉：學生余景行寫給邢天倪的書信體
〈神釋〉	〈神〉：邢天倪兒子補習老師吳幸晨的日記體

董啟章小說《神》與陶淵明組詩〈形影神三首〉，形式上同樣分成三部分，同樣也具三種敘事觀點。《神》把陶詩情節化，以陶詩為基礎，創造了不同的人物，名字取自陶詩篇名的諧音或本字：邢天倪的「邢」是「形」的諧音、余景行的「景」是「影」的本字，吳幸晨的「晨」是「神」的諧音，而位置亦有對應，「邢」、「景」、「晨」分別是名字中第一、二、三個字，正好對應陶詩三首的順序。

除了形式上，小說《神》中人物角色的形象、觀點與陶淵明組詩〈形影神三首〉亦有互相對應的部分。陶淵明詩〈形贈影〉中的「形」稱「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悴之。」因觀察到天地山川的永恒不變、花草樹木的循環不息，「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茲。適見在世中，奄去靡歸期。」感嘆人雖然是最有靈性和智慧的動物，卻不如大自然其他生物一樣恆久，剛才仍在世間相會，但轉眼間卻離去沒有歸期。「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形感嘆自己只是區區一個形體，沒有升仙的法術，始終也會逝去，因此勸影聽取自己的說話，「今朝有酒今朝醉」，不要推辭。形有感於大自然的恆久，歎息肉身的短暫易朽，故消極地勸影借酒消愁。

小說中「形」的對照邢天倪是一名中年的作家，他身體衰弱且性無能，最後更因為飲酒過度，意識不清醒，遇上車禍而去世²⁴，與詩中「形」指肉身短暫易朽的觀點相符。另外，邢天倪在他後期的小說（元小說）中，努力去追求只寫本能的境界，意圖避開所有有意義的事物，邢天倪在分享

自己創作小說的心境時亦有提到想「探討那剷除一切之後的，終極的真」²⁵。此處與陶詩略有不同，雖然都是有關「自然」，但作者把陶詩中指向花草樹木的「自然」，轉化成了性、本能的「自然」，也許是性或本能的描寫更具詮釋空間，涉及權力、政治等等的議題，因此作出此改動，於乙部會再作詳述。

此外，陶詩中的形因洞悉人生短暫，故態度消極，借酒消愁。小說中的邢天倪態度同樣消極，他本來寫嚴肅文學，但因為當時政治環境太複雜，加上身體抱恙，便轉向寫色情小說，有意避開混亂的政治圈。兩者都是消極地逃避現實，「沉溺於官能刺激」²⁶，陶詩中的「形」沉溺於無益的酒，小說中的邢天倪沉溺於（本質上）無益的色情小說，他兒子的同學會嘲笑他是「鹹濕小說家」²⁷，甚至連作者内心其實有時也對此感到「難以啟齒」和自我質疑²⁸。

小說中余景行的人物形象行為亦是參照陶詩中「影」的觀點。陶詩〈影答形〉中，影說：「與子相遇來，未嘗異悲悅。」指的是「形影不離」，兩者之間的悲傷和喜悅也是共同的。「此同既難常，黯爾俱時滅」形、影難以保持長久不分離，當人一死，形和影同時消滅。「立善有遺愛，胡爲不自竭？酒雲能消憂，方此詎不劣！」陶詩中的「影」勸「形」在生時多做有益的事，便能遺愛後人，即使形體短暫，至少有名聲留下。雖然酒能夠消除憂愁，但對比起立善還是太差劣了。

小說中余景行如陶詩中的「影」，積極「立善」，他作為文學共同會的主要執行者，不停地寫計劃書、搞活動，追求效益、肯定和成績²⁹。除此，他也多次勸邢天倪重新帶領文學共同會，重新關注本土文學³⁰。

小說中余景行（影）是邢天倪（形）的倒模、心之鏡像³¹，二人有非常多的共通之處。邢天倪認為余景行總是能把他看透³²，例如余景行能看出他再讀陶淵明和莊子，是存有某種「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意思³³。在寫作上，余景行被視為是邢天倪的忠實追隨者，從一開始寫作，其作品便被認

²⁵ 《神》，第 24 頁。「既然自己是個異性戀者，又是個男性，從自己的角度出發，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吧。總之，對於先來一番理論性的全盤思維才下筆，我已經感到十分厭倦了。我唯一有意識的，就是試圖去除一切性和本能以外的東西，管他是性別的、社會的、政治的，甚至是情感的。」同註。

²⁶ 《神》，第 218 頁。

²⁷ 《神》，第 53 頁。

²⁸ 《神》，第 45、50、53 頁。

²⁹ 《神》，第 21 頁。

³⁰ 「今天約老師出來，坦白說，當然是想說服老師復出，重新帶領文學共同會。」《神》，第 69 頁。「後來我們一群文學青年，基於老師你（筆者按：邢天倪）提出的文學公共性的理念，創立了文學共同會，希望通過組織和行動，去建設一個文學生活的共同體，以抗衡權力和價值也越來越傾斜和歪曲的世界。在老師的帶領下，共同會慢慢走上了軌道。」引《神》，第 71 頁。

³¹ 「他根本就是我的心的鏡像。」《神》，第 68 頁。

³² 「影總是能夠思我所思，甚至竟然比我自己更通透。」引《神》，第 66 頁。

³³ 《神》第 67 頁。

為是模仿邢天倪，一開始所受到的讚賞，後來卻變成了無法擺脫的缺點³⁴。後來邢天倪發現余景行並不是刻意模仿他，只是在性格的內核中，二人有著極為相似之處，只是兩人的實際取向並不一樣³⁵，邢天倪形容：「你是出，我是處；你是顯，我是隱；你是言，我是默」³⁶，他自己是個背叛自己過往的信念的軟弱者³⁷，余景行卻是個行動者³⁸。邢天倪亦曾敘述過依然年輕、依然對世界充滿著期望、依然確信自己能為世界的改變付出努力的余景行，是失落的過去的自己的寫照³⁹

陶詩中〈神釋〉則指出，「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大自然無偏愛，萬物皆按各自規律發展。「與君雖異物，生而相依附」，神與形、影是互相依附，不能豁裂的。「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善常所欣，誰當爲汝譽？」無論是〈形贈影〉所言的飲酒忘憂，還是〈影答形〉所言的立善留名，兩者同樣虛妄。「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多想無益，應當順乎自然，不為生命的長短而有所悲喜，應當去到盡頭時便當跟隨命運，毋須多慮。

小說中吳幸晨（神）的設定是一名修讀數學科的女大學生，數學是最接近自然的真理，有一定的規律，呼應「萬理自森著」。她率性純真，邢天倪曾作此評論：「你的優點，正正就是你的無知。」⁴⁰由此可見，她沒有「甚念」的障礙。故此，吳幸晨也是一位能做到「不演之演」的戲劇演員。吳幸晨本來是符合大眾標準的「女神」，但後來因為在臉書上發表了與主流不同的個人言論而被眾人唾罵，由這件事開始，她從「沒有一點自己」的「女神」，變成了回歸自然、以素顏示人、不再活在別人目光下，正是「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成為了莊子觀念中真正自由的「神人」⁴¹。在故事的結局中，邢天倪（形）與吳幸晨（神）交合，最後形消失了，也可以見到「形神合一」、「去形留神」的觀念。

³⁴ 《神》，第 60 頁。

³⁵ 「影，你說中了我心底的話。我不得不承認，你真是和我太相似了。其實我早就察覺到這一點。起先並不過於擔心，甚至有點沾沾自喜。誰不喜歡自己有模仿者、追隨者呢？但是，我後來漸漸發現，你並不是刻意模仿我，而是在性格的內核中，你和我有某些極為相似的地方。你說的軟弱，可能是其中之一。但我一直跟自己說，沒有這麼一回事。我認為你跟我是截然不同的兩類人。」《神》，第 217 頁。

³⁶ 《神》，第 68 頁。

³⁷ 「那就承認自己的軟弱吧！那就去做一個徹底的軟弱者吧！」《神》，第 218 頁。

³⁸ 「看見你投了入行動者的角色……一看見你，甚至是想起你這個影子，心中就會冒起莫名的忿然。好像你的行動力，你的追求，你的信念，甚至單單只是你的存在，都在反映著我的不堪，在批判著我的退縮。或者如你所說，就是所謂的軟弱了。」《神》，第 218 頁。

³⁹ 《神》，第 61 頁。

⁴⁰ 《神》，第 378 頁。
⁴¹ 《神》第 450 頁。

小說在人物塑造和情節構思上有呼應陶詩，是對陶詩的解構，而小說情節同時亦反過來突顯了「形」、「影」、「神」三者互相依存的關係。當中，小說〈形〉（邢天倪的意識敍述）為小說中的「真實」，〈影〉（余景行寫給邢天倪的書信體）與〈神〉（吳幸晨的日記體）皆為小說中的「虛構」，是為紀念去世的邢而創作的，在小說中多處亦有所提示⁴²。這正正對應了「形」為實，「影」、「神」為虛的概念。

乙、小說中以後設的手法對文學的探討

董啟章的小說常用後設手法（或稱複調小說、元小說），他曾指，與其說他在建構小說，不如說他在模擬小說⁴³。「後設」是在小說虛構中的另一重虛構，小說清醒地認識到自身的虛構性，側重披露虛構的過程，而非情節、故事的結果⁴⁴。當中批評的視角被融入小說，從而使得讀者與作者合而為一⁴⁵。小說《神》中，邢天倪和余景行都是作家，當中有提到邢天倪的作品（小說中再虛構的小說）有《閑情賦》、〈針〉、〈石〉、〈易服〉、〈亂牙〉（下統稱元小說）。除了標題和內容的敍述外，《神》更虛構了小說中不同人物解讀元小說的討論，透過虛構作者與不同讀者的觀點，揭示了解讀小說敍事的多重可能性。當中可分成四個觀點，分別由作者邢天倪、文學評論家忽滑谷、作者余景行、戲劇演員吳幸晨帶出。

第一個觀點是由作者邢天倪帶出的，探討小說「只作事實性敍述，不含任何意味」的可能性。年輕時的邢天倪創辦了文學共同會，把文學從靜態的寫作和閱讀轉化成行動實踐⁴⁶。他以小說書寫本土議題，寫出了被評論者標籤為抗爭文學的小說。然而晚年的邢天倪，亦即小說中「現時」的邢天倪，對文學的功能性、政治作用感到倦怠，堅決地背叛自己過往的信念，放棄了以往的嚴肅文學、「有所為」的文學，改為書寫只有性的情色小說⁴⁷。他刻意採用第三人稱的敍述，力圖去除小說中的

⁴² 「有少數第一人稱敍述形式，是比較可以接受的，那就是書信體、日記體，或者刻意顯露自身的書寫性質的小說。」引《神》，第 147 頁。「罔兩說：虛構的就是小說。是嗎？是這樣嗎？我很疑惑。那麼，說謊或者欺騙，也是小說嗎？腦袋裡的幻想，如果寫出來的話，也是小說嗎？如果我持續地寫一部假的日記，那也可以視為小說嗎？」引《神》，第 362 頁。

⁴³ 許子東：《香港短篇小說初探》（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5 年），第 27 頁。

⁴⁴ 劉象愚、楊恆達、曾艷兵：《從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363 頁。

⁴⁵ 《從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第 397 頁。

⁴⁶ 《神》，第 214 頁。

⁴⁷ 「為了貫徹一個軟弱者的角色，我頑強地否定自己從前的方向，堅決地背叛自己過往的信念。我決定放棄一切價值和道德考慮，去當一個沉溺於官能刺激中的小說家！去寫色情小說！去取消一切的信念，無論是政治的、文學的、倫理的，去追求純感官的存在！」引《神》，第 218 頁。

性別、社會、政治，甚至情感，希望能避免個人情感的牽涉，做到不帶道德或價值批判⁴⁸。這個時期的邢天倪沉醉於閱讀陶淵明和莊子，當中亦暗示了其隱逸思想。邢天倪在寫與陶淵明作品《閑情賦》同名的情色小說時，甚至否認原作中香草美人式的政治隱喻，認為只是情慾的描寫⁴⁹。由此可見，邢天倪否認和拒絕小說「文以載道」的功能性，只想作為事實的反映，去除社會的意義，不參與道德或價值批判，嘗試追求「剝除一切之後的，終極的真」⁵⁰。但在此過程中，邢天倪亦有所質疑，思考在此前提下創作的小說似乎陷入了有形無神的困境，在去除「自我」，意圖消除意義的同時，也失去了自心⁵¹。

第二個觀點由文學評論家忽滑谷帶出，探討以「文學隱喻的多重映射與還原」去解讀小說。忽滑谷是大學教授，教導香港文學科，在政治光譜上屬於本土派。他一開始認為邢天倪書寫情慾小說是墮落的表現，背棄了過往的社會關懷，他把邢天倪的小說解讀成對新興政治形勢（本土派冒起）的逃避，與時代的呼聲唱反調。但後來又改變想法，從邢天倪的色情小說中解讀出具政治意味的隱喻（亦即邢天倪所言的「以政治騎劫文學」）。例如在元小說〈針〉中，內地背景的女醫師（施虐狂）利用針灸治療本地大學政治系教授（被虐狂），男病人與女醫師發生性行為，以為此舉是對女醫師的回敬，事實卻在女醫師的計劃之中。忽滑谷從中解讀出中港關係的政治隱喻⁵²。又例如，在元小說〈石〉中，一對攀石運動員在石牆、懸崖以高難度動作交纏。忽滑谷則從中解讀出對「高牆」的挑戰、激進的抗爭、象徵港人對自由的渴求⁵³。

⁴⁸ 「我再度轉向，寫作情慾小說，藉此排除所有外在的因素，而集中於人的本能，但卻一律採用第三人稱的敘述，好像只有這樣做才能避免個人情感的牽涉。我還以為，在這些全無道德約束和情感投入的小說中，我終於能徹底去除那個令人厭惡的自我，而達到純客觀的呈現。這客觀性跟故事內容的不倫、奇情和誇張沒有牴觸，因為它無關事實本身，而只關乎『事實性』——赤裸裸的、無雜質的、無添加的、純粹的『事實性』。這，也許就是這些小說最為『色情』的地方，也是我個人對於『色情』的定義——比身體描繪和性交描述更深一層的全然的裸露。」引《神》，第 144 頁。

⁴⁹ 《神》，第 52 頁。

⁵⁰ 《神》，第 24 頁。

⁵¹ 《神》，第 145 頁。

⁵² 「談到〈針〉那篇小說的時候，他指出那個帶有內地背景的女中醫師，利用針灸治療來『控制』甚至是『入侵』她的男病人，也即是那位本地大學教授的身體。這位教授是甚麼學科的呢？是政治系啊！這不是滿有深意嗎？通過某種『醫術上』的調理，女醫師成功地挑起了這位男病人的情慾，跟他在診所的治療床上發生了性關係。男教授還自滿地以為，自己終於能以更為粗壯和堅硬的『巨針』，去回敬女醫師一直以來給他施針所造成的肉體痛楚。實情是，他的性能力的恢復和強化，完全在女醫師的計算和操控之中。忽滑谷於是說，在這個典型的虐待狂和被虐狂的故事裡，被虐的一方是代表著本土的男教授，而施虐的其實就是象徵大陸的女醫師了！他把這篇小說作為政治隱喻來閱讀，當中看似純屬豔情故事的元素，就變得具有現實的揭示性和批判性了。」引《神》，第 223 頁。

⁵³ 「又好像是另一篇小說〈石〉，寫的原本是頗為純粹的肉體奇觀的故事，焦點完全在於一對男女攀石運動員，以健碩的身體和高難度的技巧，在石牆甚至是海邊的懸崖上，所做出的一系列雜技一樣的做愛動作。當然，故事在心理的層面上，也鋪陳了較為年少的男主角的成長經歷和性啟蒙，和比較年長的女主角在愛情和婚姻方面的失落。不過，忽滑谷卻另闢蹊徑，把它解讀成對於所謂「高牆」的挑戰，甚至把這對男女的肆無忌憚的高空性行為，比擬為一種更為激進的抗爭，也即是她所說的——猶如在獅子山頂上所懸掛的，以赤裸的血肉之軀所構成的直幡！兩人熾烈不可收拾的情慾，就

第三個觀點由學生作家余景行帶出，探討以「小說內部的政治權力運作」去解讀小說，達致「無用之用」的實踐。他認為邢天倪「是富有經驗、自覺性和責任感的作家，不會純粹自暴自棄地轉型色情小說，當中一定有更深層的用意」⁵⁴。從邢天倪大量閱讀陶淵明中可見到相關的暗示。陶淵明生於政治異常黑暗的魏晉南北朝，採取莊子「生而曳尾於塗中」⁵⁵的態度，隱逸於田園間，於作品《歸園田居》中提到自己「質性自然」，「違己交病」，難以做出違背本心之事，當中「越是極力把歸隱的意圖純粹化和個性化，越反照出政治的污濁和壓迫」⁵⁶。隱逸詩看似是對政治的逃避，實際上卻是「個人意志對權力意志的反抗」⁵⁷。余景行認為邢天倪是希望通過隱與默，表達對自己對當前政治狀況的不滿⁵⁸：溫和派、「左膠」、和理非與本土派、勇武派本應是同路人，卻互相攻擊，於是邢天倪嘗試從陶詩和莊子中尋找超越是非爭逐，以安頓混亂情緒的虛靜心境⁵⁹。

在強調功能的當代社會中，文學是「無用之物」，既不如以往有教化作用，又不能藉此取獲大量財富，故此寫作是「無用之用」的實踐⁶⁰。作為非行動的行動，相對於行動的抗爭，是反抗體制的另一種可能⁶¹。因此，小說應該把作者個人生活的全部經驗都融進了寫作行為和作品裡，通過小說自身的權力運作，而非連結現實的隱喻，達致「不寫之寫」的境界。例如在元小說〈石〉中，運動或體壇本來就是極為體制化的事物，運動比賽由一項項規則組成，但元小說中男女主角作為攀石運動員，二人的行徑超出體制能容納的範圍。他們攀石時繫在身上的繩索隱喻約束，但二人又能在最原始的性中得到「解放」⁶²。文學作品中帶有研究和批判，但未有具體的行動提示，是為「無用」，不同於忽滑谷所解讀的，具體的挑戰和抗爭。而「無用」並不一定是「無意」的，可以是有意求之。

⁵⁴ 《神》，第 65 頁。

⁵⁵ 《神》，第 239 頁。

⁵⁶ 《神》，第 240 頁。

⁵⁷ 《神》，第 240 頁。

⁵⁸ 《神》，第 240 頁。

⁵⁹ 《神》，第 241 頁。

⁶⁰ 「但是，實際上說，甚麼是『無用之用』呢？我立即想到的，就是文學，因為在以功能為目標的當代社會機器中，文學就是「無用之物」的最佳代表。現在的文學，既沒有創富價值，也沒有教化功用，基本上是連點綴的意義都沒有的東西。」引《神》，第 236 頁。

⁶¹ 「也許所謂的反抗，並不一定以狹義的、表面的形式，也即是我們平常所理解的行動來實踐的。相反，非行動有時候也可以是一種行動。『無用之用』，不就是一種『非行動的行動』嗎？也即老子所說的『無為而無不為』。」引《神》，第 236 頁。

⁶² 「就算是〈石〉這篇也一樣，充滿著運動體制對參與者的打造。要知道各種運動本身，就是由規則所構成的，而各種大小的比賽或運動會，排名或資歷認可的方式，以及所謂「體壇」本身，都是極度體制化的事物。當中跟商品和媒體的交織，更加是不必多說的事實。身為知名攀石運動員的男主角，以自己為品牌開設了攀石場和訓練學校，以商業方式運作和推廣。而女主角也曾經是抱石國際賽冠軍選手，當過體育用品廣告代言人，但因為傷患而成績下滑，漸漸地在體制裡失去位置。可是，他們在深夜無人的攀石場上，一邊攀爬高牆一邊性交，行為的荒唐怪異，完全超出了體制所能界定和容納，甚至成為了對體制的褻瀆。攀石所需配戴的繩索和安全帶等裝置，既增加了色情場面的效果，也充分發揮了約束的隱喻作用。當然，這個隱喻應該比忽滑谷的「高牆」隱喻合理吧。「裸命」既被繩索所「束縛」，但卻同時

第四個觀點則由戲劇演員吳幸晨帶出，探討語言的界限與寫作的本心。吳幸晨在與邢天倪討論的過程中引用了維根斯坦的一套理論——「The world is my world, I am my world」（我的語言，是我的世界的界限，而我不能超過自己的語言）⁶³，「知道」（knowing）是不可能超越每個人自己的界限的⁶⁴，語言既是溝通的工具，但也畫定了溝通的界限。而小說實踐的最高境界是「形神合一」，提出文學應該回到自心，去除一切局限，當中包括事實性、時空、敍事技巧、作家的自覺等等，留下的是無意識、隨心而至的美。「What can't be spoken, can be shown.」⁶⁵小說的最高境界不重於事實的真確性（形），而在於真誠（神）。當達到生死一體、物我不分，則沒有敍述的邊界，亦無第一人稱的局限，而邢天倪鐘愛的陶淵明和莊子正正就能達到此境界。

邢天倪提到陶淵明的〈挽歌詩三首〉，當中「我」在未死之時，卻能敍述自己已死的時刻，陶淵明不但「思索」自己的死亡，更「敍述」自己的死亡⁶⁶。但由於情景的描寫相當仔細，這種必然出於「想像」的敍述卻與「事實」相當貼近，毫無顧忌與隔礙，令人產生「死者自道」的錯覺⁶⁷。敍述自己的死亡並不符合第一人稱小說的書寫規則⁶⁸，自身的死亡是敍述的邊界，此為第一人稱背後永遠存在的敍事學「黑洞」⁶⁹。對此，他在莊子中找到解答。〈德充符〉中言：「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把生死看為一體，把「可」與「不可」看成一致，解開枷鎖⁷⁰。〈大宗師〉又言：「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死生存亡是一個整體⁷¹。當去到生死不分，便沒有敍述的邊界，亦自然沒有第一人稱的局限，能「化不可為可，寫不寫之寫」⁷²。除了生死的界限，莊子亦提出無所謂美醜的自覺和觀念，只聽任於自然，如此便是真正的自由，便是神人⁷³，這同時也反映了為何吳幸晨是「神」。

毫無顧忌地在最原始的性之中「解放」自己。到了最後，兩人在海邊的懸崖上合演的一幕，就幾乎還原為猿猴類的狀態了。」引《神》，第 233 - 234 頁。

⁶³ 《神》，第 375 頁。

⁶⁴ 《神》，第 375 頁。

⁶⁵ 《神》，第 373、530 頁。

⁶⁶ 《神》，第 144 頁。

⁶⁷ 《神》，第 144 頁。

⁶⁸ 《神》，第 145 頁。

⁶⁹ 《神》，第 147 頁。

⁷⁰ 傅佩榮：《逍遙之樂——傅佩榮談《莊子》》（臺北：天下遠見，2012 年），第 398 - 399 頁。

⁷¹ 《傅佩榮談《莊子》》，第 490 頁。

⁷² 《神》，第 148 頁。

⁷³ 「不過，其實莊子並不是要分開美人和醜人，如果是的話，層次就很低了。他想說的是，無論美醜，都不要緊，肉身都是約束。驕於美，羞於醜，那就是不自由。相反，美不驕，醜不羞，甚至不知美不知醜，無美醜的自覺和觀念，聽任於自然，那才是真自由。這種，就叫做全德之人，或者神人了。」引《神》，第 450 頁。

除了莊子和陶淵明外，「神」的部分亦以演員的狀態作探討，當中引用了德國劇作家 Kleist 的〈關於木偶劇場〉，文章提出木偶的動作「遠遠比人類富有美感，更為優雅」⁷⁴，因為它作為一個純粹的形體，不像人類，會受到知識和自我意識的阻礙⁷⁵。「木偶隨意而動。隨意，但又沒有自覺，沒有造作。」⁷⁶邢天倪指吳幸晨剛開始生氣的時候，也近乎木偶的狀態，因為她「忘掉了自己的狀況，處於完全自然的爆發。」⁷⁷在吳幸晨認識到「忘我」這個概念後，她漸漸達到了「不演之演」的境界：「我好像不必用力似的，腦袋、身軀和四肢，彷彿自己動了起來。又或者，如他所說，因為體內的某一點、某一條軸線的變化，牽一髮而動全身。但這牽動全身的『一』，是甚麼呢？我發現，我一開始去想，那種美妙的感覺便受到障礙，而我一放開想法，它又回來。」⁷⁸之於寫作亦同樣道理，當有自己在寫作的自覺，則會有所窒礙，變得造作。故，第四個觀點，是去除所有形式上的局限，入無我之境，隨心而行。

作家董啟章的作品不乏對「作家身分」的叩問與對文學的反思⁷⁹。除了小說敍事的探問外，《神》亦可能是董啟章對文學在於現今社會的探問——向來被功能社會視為「無用」的文學，在經歷雨傘運動、旺角騷亂後的政治暗潮中該如何自處？小說《神》中藉由不同的人物虛構出關於小說敍事與解讀的四重觀點，如同陶淵明組詩〈形影神三首〉，虛構多重人物，其實是在進行自我對辯與探討，陶淵明探討生命、董啟章的《神》除了生命以外，更探討文學與社會。總結以上四個觀點，對於「文學與政治」的探討，《神》提出了文學之於政治的四種可能情景：

文學和政治的關係：文學應否／如何觸碰政治？	小說敍事的多重可能性
1. 文學不要觸碰政治	(邢天倪帶出的觀點) 只作事實性敘述，不含個人價值取向
2. 文學要觸碰政治：透過連結現實的文學隱喻，達到暗示行動的政治功能 (文學中的政治吞噬文學本身)	(忽滑谷帶出的觀點) 文學隱喻的多重映射與現實還原

⁷⁴ 《神》，第 227 頁。

⁷⁵ 《神》，第 227 頁。

⁷⁶ 《神》，第 382 頁。

⁷⁷ 《神》，第 379 頁。

⁷⁸ 《神》，第 382 頁。

⁷⁹ 鄒文律：〈論董啟章《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和《時間繁史·啞瓷之光》對作家倫理責任的叩問〉，中國文學學報，第 4 期（2013 年 12 月），第 161 - 187 頁。

3. 文學要觸碰政治：「無用之用」，非行動的行動 (保留文學的本質，作為靜默的抗爭手段)	(余景行帶出的觀點) 小說內部的政治權力運作
4. 無「要」無「不要」，形神合一，隨心而行	(吳幸晨帶出的觀點) 去除所有形式上的局限，隨心而行

以上四個觀點皆可能反映了作者董啟章不同時期對文學的想法。

丙、小說《神》本身對以上探討觀點的看法和實踐

上文概括了四個小說敍事的可能性。以下將會通過小說《神》本身，研究董啟章在此書中對以上四種觀點的嘗試與實踐，以及其結果，來探究董啟章可能的真實想法。

首先，對於小說只強調事實性，去除意義和批判（邢天倪所帶出的觀點），小說《神》似乎已經揭示了此觀點在實踐上存有難度，甚至是悖論。在《神》中，邢天倪的意識敍述指出：「我最終還是無法擺脫『意義』，被『意義』的魔咒緊緊攫住。」⁸⁰即使邢天倪嘗試把文學、或語言本身推到它的邊緣，去除文字中一切深層意義，但他不得不承認，他這個實驗最終還是以失敗告終，未能夠寫出真正的無意義的作品⁸¹。

如果把邢天倪對照到現實中的董啟章，或許《神》這部小說也是董啟章意圖寫出的「無意義的作品」，書的護封形容《神》是「『自然史／香港三部曲』、『V 城系列四部曲』後，／香港知名作家董啟章出道以來，尺度最大／重寫、解構陶淵明詩〈形影神〉／《心》姊妹篇，長篇情慾小說」，與小說中作家所寫的同是「情慾小說」，或多或少也有個人的投射。但看《神》當中既有對文學的對辯、對政治社會現況的討論、對生命與身體的探討，即使作家董啟章一如小說中的作者邢天倪，想進行對文字的實驗，試驗語言無意義的可能性，亦是尚未達成，故在小說中段，亦坦承了此觀點難以執行。

小說《神》中透過余景行分析以上觀點執行失敗的原因：「性描寫自身已經存在價值判斷，而價值判斷即是道德倫理」⁸²即使邢天倪（或是董啟章）嘗試單純寫性、寫身體、寫本能，但在敍述期間，必然牽涉到內部的權力分配，甚至在遣詞用字之間，也包含了道德判斷。因此「『無意義的作品』是個矛盾語……『作品』之所以能稱為『作品』……必然是具有特殊的『意義』」⁸³。即使是陶

⁸⁰ 《神》，第 226 頁。

⁸¹ 「我只是試圖把文學——或者更根本地說是語言——這種生產意義的機器又或遊戲本身，推到它的邊緣……所以，給這些小說注入任何深層的意義，無論是政治的、倫理的，還是心理的，都跟我的原意相違。不過，這也許恰恰證明了，我的實驗的失敗——我沒能寫出真正的無意義的作品。」引《神》，第 226 頁。

淵明拒絕政治的隱逸詩，也指示出某種政治實踐，於陶淵明身上的是簡樸族群生活的復歸⁸⁴。故此小說《神》引證了「小說不含個人價值取向」的觀點是難以實行的。

而對於小說能透過文學隱喻，達到政治功能（忽滑谷帶出的觀點），小說《神》中並不否定此在執行上的可能性，甚至以元小說的方式展示了如何能從未直談政治的文本中解讀出政治隱喻。甚至邢天倪的經理人羅莎蓮也指出，其書《閑情賦》兩個賣點也包括了政治隱喻⁸⁵。即使邢天倪抗議，指其小說完全沒有政治考慮，羅莎蓮卻指出「寫的時候腦子裡有沒有政治，是完全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讀者能不能讀出政治來。在西方人眼中，中國文學或者華語文學，藝術性是微不足道的，能夠挑起他們的興趣的，只有政治，也即是壓迫者和反抗者的故事。」⁸⁶故此文學被解讀出政治意味並非不可能之事——不論作者原意是否如此。

對此，邢天倪（或多或少影射了作家董啟章）顯得無奈，覺得「書已經好像不是我自己所寫的了」⁸⁷。邢天倪不太認同對文學的過份解讀。董啟章的妻子兼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助理教授亦指出「我認為他寫作最大的挑戰都是面對各種讀者可能的誤解」⁸⁸

小說中當吳幸晨提到政治立場為本土派的大學教授忽滑谷所教授的香港文學課，他說也許是第一位自覺地具有本土意識的香港作家，通過作品與論述兩方面去闡釋本土的立場，並稱他為「本土之父」⁸⁹。忽滑谷亦有解釋自己為何對邢天倪的作品由貶轉褒，當中亦涉及政治原因：「邢天倪的作品，以前是明『左膠』暗『本土』的，近年去除了『左膠』的外衣，以看似放任——或者應該說是『放蕩』的方式，去建構新的本土思考。」⁹⁰對此，邢天倪表示反對和氣憤，認為是對作品的「騎劫」，並稱忽滑谷為「學術恐怖分子」⁹¹。董啟章之後亦指出「必須維護文學的純粹性，把文學視為目的，而不是手段。如果把文學視為手段的話，就算這手段所引向的目的十分高尚，對文學自身的價值也會有所減損或傷害。」⁹²這亦對應了他在書中所持的觀點，不太認同對文學的過分解讀，不希望文學作品變成政治工具而被忽略了本身的價值。

⁸⁴ 「隱逸詩雖然看似逃避現實，拒絕參與其中，但卻反而因此確立了政治的範疇，為政治劃定了邊界。」引《神》，第240頁。

⁸⁵ 《神》，第53頁。

⁸⁶ 《神》，第54頁。

⁸⁷ 《神》，第54頁。

⁸⁸ 許維賢：〈一條不能失守的戰線——跨界走訪董啟章〉，《蕉風》，第498期（2007年7月），第100-109頁。

⁸⁹ 《神》，第386頁。

⁹⁰ 《神》，第348頁。

⁹¹ 《神》，第417頁。

⁹² 董啟章gK《無用之用》，《明周文化》專欄（2019年7月18日），載於 <https://www.mpweekly.com/culture/115795>。

但縱觀小說《神》中，又並非全然沒有政治隱喻。觀察書中不同的角色，似乎各人都有背後代表的一種政治立場。例如邢天倪的人物設定為中年，對政治已失去了年輕時的憧憬和熱誠，甚至感到倦怠，只想「斷絕交遊，退隱起來」，閑時讀讀莊子和陶淵明⁹³。他產生了「辯不若默」的觀點，認為「暫時避開本地混亂無比的政治圈，是個明智的決定」⁹⁴。邢天倪可以代表對政治感到失望、無力的中年知識分子，又或者他自稱的「小資產階級」⁹⁵。而余景行則是年輕的行動者、溫和的抗爭者、改良者，或是本土派口中的「左膠」，他「對世界依然充滿著期望，而且依然確信，自己能為世界的改變付出努力」⁹⁶，卻被邊緣化，在政治運動中「受到本土派激進分子的追擊，完全失去立足之地」⁹⁷。忽滑谷則代表了本土派⁹⁸，擁有相當多的年輕追隨者，在文學或者文化界中被奉為大師一樣的人物⁹⁹。書中有其他年輕角色也是本土派的擁護者，例如吳幸晨的室友罔兩，熱心參與政治運動，作為大學新生已經加入罷課，並親身經歷雨傘運動中警察在金鐘施放催淚彈的一幕¹⁰⁰。又例如吳幸晨的前男友危保光，甚熱衷於「本土」議題，還加入了港大某本土組織¹⁰¹。至於吳幸晨代表的是對政治毫不關心、毫無認識的「港豬」或者是「和理非」¹⁰²。她在臉書上寫了幾句對於旺角魚蛋事件的感想：「以暴逆暴，這完全不是我心中所愛的本土」¹⁰³，卻被群起攻之，被罵「死港豬」、「死非豬」等。當中文學共同會亦可視為香港政治光譜變化的影射，文學共同會在初期稟持開放、自由和平等的理念，但如今，曾經以文學的組織和行動去抗衡權力和價值越發傾斜和歪斜的世界的青年，大比數贊成走米本土派路線的忽滑谷加入文學共同會的申請，甚至支持他當會長，隱喻了政治局勢的變化：當初的「和理非」轉向「本土派」激烈抗爭主張的不在少數。

因此，縱然在小說中曾提出對文學的過分政治化的抗議，但就《神》而言，作家董啟章也未有全盤否定文學的政治元素及隱喻，只是未有如書中忽滑谷一樣轉化為行動提示。由此可見，作家董啟章認同文學可以帶有政治元素，但同時亦應保留其文學的本質，避免完全被政治「騎劫」，淪為政治工具。

⁹³ 《神》，第 35 頁。

⁹⁴ 《神》，第 61 頁。

⁹⁵ 《神》，第 59 頁。

⁹⁶ 《神》，第 62 頁。

⁹⁷ 《神》，第 260 頁。

⁹⁸ 「雖然沒有打正旗號，他走的也近似是『本土派』的路線。」引《神》，第 70 頁。

⁹⁹ 「現在有很多年輕追隨者，已經被奉為大師一樣的人物。至少，在文學或者文化界中是這樣。」引《神》，第 70 頁。

¹⁰⁰ 《神》，第 259 頁。

¹⁰¹ 《神》，第 391 頁。

至於小說作為「無用之用」，非行動的行動，以及「不寫之寫」，回顧董啟章在雨傘運動後的訪談，他指出：「對於重大的事情，我們要沉着，不用急於去寫它。又或者，根本不用去寫它，它的影響和意義也會在文學中浮現。有時候，沒有直接寫的，反而是最重要的東西。」¹⁰⁴，正正是「不寫之寫」的觀點。書中亦指出「如果能寫而不寫，那就真是境界了。」¹⁰⁵從小說《神》亦可見作家董啟章對此的嘗試。書中引用了維根斯坦的哲學理論：「凡是能說的事情，必然能說得清清楚楚，而不能說的事情，不如保持沉默。」¹⁰⁶，並大量地討論了陶淵明和莊子，尤其是對於陶淵明以隱逸詩反映對政治狀態不滿的「不寫之寫」（參考乙部）。在甲部曾分析小說《神》解構陶淵明的組詩〈形影神〉，此舉並非無意為之。除了都是作者的自我對話之外，亦因為陶淵明是著名的「隱逸詩人」。當中很大可能暗示了對陶淵明「隱逸」思想的認同與共鳴，通過「解構」的手法去表現，為「不寫之寫」。

然而，小說《神》又未至於全然的「不寫」，在小說當中提及了許多政治元素，包括不同的政治事件（如雨傘運動、魚蛋事件）、不同的政治取態（溫和派、本土派、「港豬」），甚至不乏對政治的評價，如余景行提到被稱為「左膠」的一代就算推動的運動未有成果，但始終付出了努力，卻被新一代的抗爭者唾罵，認為即使手法不同，但都是同樣反建制，不應至於相互為敵¹⁰⁷，並提出當中始作俑者是提出「城邦論」的「國師」¹⁰⁸。可見小說中其實並不乏對政治的直寫，所以雖然書中提出「不寫之寫」，但似乎在「解構」的暗示之外，未有真正實踐。

不過小說能達到的是「無用之用」。正如上面所述，當中透過主角邢天倪的「倦怠」暗示了對現今政治的不滿，又不乏政治元素，直抒對本土派與溫和派互相攻擊的惋惜。此處可理解為靜默的抗爭手段，不但是對建制的抗爭、也是對反建制派的兩個支派的勸諫，但卻未有具體的行動指示，保留了文學的本質。

¹⁰⁴ 「雨傘運動的影響正在浮現，社會對它的看法也會隨時間而出現不同的觀點。經過了激情和憤怒的階段，我們會看得更清楚。」柯文君：〈董啟章：今次寫科幻小說(16:00)〉，《明報文學版》，2018年7月8日。

¹⁰⁵ 《神》，第408頁。

¹⁰⁶ 《神》，第372頁。

¹⁰⁷ 「就算我們推動的幾次運動都沒有取得成果，但怎麼說都是付出了努力，為甚麼結果卻竟然變成了叛徒逆賊似的，被人罵到狗血淋頭？而且，罵的還不是我們所反抗的敵人，而是新一代的抗爭者啊！就算彼此的理念不同，手法不同，但理應都是同樣站在反建制的一邊，就算不相為謀，也不至於相與為敵吧？」引《神》，第244頁。

¹⁰⁸ 「後來我就明白，這從來也是群眾鬥爭的規律，抗爭者之中出現的互相鬥爭，往往比針對當權者更為慘烈。新出來的激進者，為了要奪取主導地位，締造新的正確路線，首先便要打倒前一批的抗爭者。最先被消滅的，是溫和派或者中間派，然後，便是我們這些本來已經是最激進，但卻依然被認為過於軟弱的人。但是，由失敗或無用，變成了根本就是出賣或背叛，當中的邏輯究竟是甚麼呢？從來都沒有人深究。總之就是人云亦云地傳開去。而這種仇恨言論的始作俑者，就是提出『城邦論』的那位『國師』」。引《神》，第244頁。

而對於「形神合一，隨心而行」的觀點，邢天倪在思考其寫作時，提到「也許，我應該簡單單地，回到自心」¹⁰⁹。

未能完全做到「不寫之寫」可以是作家董啟章「隨心而行」的一個佐證。小說中有很多對「不寫之寫」的論述，當中亦能推測作家對此的贊同，然而小說中未有為了要達到「不寫之寫」，便刻意迴避，反而是隨興所至，無「可寫」、無「不可寫」。吳幸晨的日記亦有講述這種狀態：「有點奇怪的是，寫起日記來，卻又沒有甚麼障礙，隨心所到，隨心而記，幾乎無需任何思索和鋪排。」

¹¹⁰

但作者董啟章在書中似乎仍充滿作家的自覺，尚未達到書中所言的「去除一切形式上的局限」。小說中以莊子〈德充符〉中「生死一貫」的狀態，解釋了陶淵明的〈挽歌詩三首〉中對自我死亡的敍述（參考乙部）。在《神》中，亦有死亡的敍述，但一切以「我」的意識為終點，未如陶淵明自由地做到「死者自道」的效果，而是靠他人（余景行的書信體和吳幸晨的日記¹¹¹）的觀點繼續（半真實半虛構的）敍述，在此可見董啟章仍未打破敍事學最終的邊緣界限，但在揭示小說的虛構方面則進行了一貫的實踐。

以上四個觀點，是作者在寫作路上的自我探問，除了第一個難以實行之外，其餘三個在小說《神》中可以見到作者的傾向：不太希望文學作品成為政治工具而損害了文學性，希望能做到「不寫之寫」，並認為小說與個人情感思想「形神合一，隨心而寫」才是最高境界。但作者的困擾或在於，在實際執行上，三者的界線難以分明，小說中示範了把文學作品政治化的例子，而「不寫之寫」、「隨心而寫」有時也有衝突，小說《神》中隨心直抒意見的部分，正正違背了「不寫」。文學如何隨心而行，但又在一些重大事件過後沉澱組織，與政治保持距離，是作家董啟章於寫作路上面對的難題，而小說《神》在這方面展現的是他尚在探索的過程，雖然在探索中釐定了個人的傾向，但對於「如何實行」則尚未有答案。故此，小說《神》面世的後兩年（2019），董啟章依然在探問：「當發生重大政治或社會事件的時候，文學人很可能會想到：究竟文學在這種處境中有什麼作用？當不少人正冒着危險在街頭抗爭，靜靜地在家中讀一本書成為了一個不但奢侈、甚至是帶有自責感的行為。而如果想繼續創作，思緒難免被民情和社會動態所牽引，要不就是心不在焉、茫然

¹⁰⁹ 《神》，第 146 頁。

¹¹⁰ 《神》，第 426 頁。

¹¹¹ 「我當初只是不明白，為什麼你會寫這樣奇怪的東西。我也不知道，應不應該相信裡面的內容。雖然有許多很明顯是虛構的，但是，也沒法排除，當中有真實的成分。」引《神》，第 518 頁。

不知所措，要不就是無法迴避責任的呼喚，湧起如何把現況融入作品中的種種念頭。可是，一轉念又猶豫，這樣做可能會把文學變成宣示立場的工具。」¹¹²

五、總結和局限

小說《神》從人物情節、與「形、影、神」的概念，解構了陶淵明的〈形影神三首〉，當中加入了很多中西方的哲學思想，亦以後設手法探討了文學作品（尤以小說為主）的可能性，藉著角色之間的討論，形成自我對話，嘗試去進行文學議題的對辯。小說探討了敍事及解讀的多重可能性，當中分為四層：「只作事實性敍述，不含個人價值取向」、「文學隱喻的多重映射與現實還原」、「小說內部的政治權力運作」及「去除所有形式、物理上的局限，隨心而行」。小說展示了第一層實際操作上的難點：在敍述的時候必然會牽涉到內部的權力分配，因此難以去除價值判斷。第二、第三層，小說《神》已清晰地把元小說的解讀過程展示出來。至於第四層，小說亦引用了陶淵明的〈挽歌詩三首〉及莊子的〈德充符〉作說明，並視其為敍述的最高境界——生死一體，去除一切限制，由心而行。

除了敍事的討論外，當中亦有對文學與政治相互關係的探討，並提出「文學應否觸碰政治」、「文學如何觸碰政治」兩個問題，亦是作者對於文學置身於現今香港社會熾熱政治氣氛下的角色的思考。當中作家董啟章示範了四種可能，包括「不要觸碰政治」、「要觸碰政治，透過指向現實的文學隱喻，暗示具體的政治行動」、「要觸碰政治，文學本身作為一種靜默的抗爭、非行動的行動（不寫之寫）」及「不刻意觸碰，不刻意迴避，只隨心而行」。而從小說當中，可見作者董啟章對第二種可能（文學隱喻暗示行動）並不太贊同，認為文學的本質被「騎劫」，淪為了服務於政治的工具。他比較認同第三、四個觀點，認為寫作最重要是隨心而行，不受拘束，如要觸碰政治，以保留文學的本質，作為靜默的抗爭，如陶淵明的隱逸詩一樣，以「不寫」「表達」對體制的不滿，則更為妥切。在政治議題上，董啟章在小說《神》中能否真正實踐「不寫之寫」仍有待商榷，皆因他在小說中不乏對政治觀點的表達，但亦正因為他未有刻意「不寫」，故是「隨心而行」的表現。

文學在一些重大事件過後應該如何自處，是作家董啟章於創作上正面對的難題，小說《神》中透過自我對話去釐清了個人的觀點，但對於具體應「如何實行」，則仍尚在探索的過程。

由於時間和篇幅所限，小說《神》中有許多線索尚未研究。當中有相當多的文本互涉，如韓炳哲《倦怠社會》、《山海經》、《易經》、大量陶淵明的作品如《閑情賦》、董啟章自己所寫的《天工開物·栩栩如真》¹¹³，甚至連「邢天倪」、「余景行」、「疏離支」等人物名字亦「大有來頭」，再加上不同的哲學理論，如莊子、阿岡本、柄谷行人、維根斯坦等等，都被寫進小說，千絲萬縷。故此，若要透徹理解作家董啟章創作的思路歷程，需要額外閱讀大量的文本。此論文謹為一個開端，以小說文本為基礎作文本細讀分析。希望日後若有機會，亦能再進一步作出研究。

六、參考文獻

1. 董啟章作品

董啟章：《神》（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7年）。

董啟章：〈無用之用〉，《明周文化》專欄（2019年7月18日），載於
<https://www.mpweekly.com/culture/115795>。

2. 參考書目

余麗文：〈歷史與空間——董啟章《V城繁勝錄》的虛構技法〉，見黎活仁編：《方法論與中國小說研究》（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0年）。

許子東：《香港短篇小說初探》（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5年）。

梅家玲：〈閱讀安卓珍尼——雌雄同體／女同志／語言建構〉，《性別論述與台灣小說》（台北：麥田出版，2000年）。

傅佩榮：《逍遙之樂——傅佩榮談《莊子》》（臺北：天下遠見，2012年）。

魏正申：《陶淵明評傳》（北京：文津出版社，1996年）。

3. 參考論文

王貽興：〈物先腐而後蟲生，還是置之死地而後生？——讀董啟章的《衣魚簡史》〉，《文學世紀》，第14期（2002年5月），第82 - 85頁。

江力麗：〈從《安卓珍尼》和《雙身》看董啟章對女性主題的思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本科畢業生論文，1999年）。

洛楓：〈歷史想像與文化身份的建構——論西西的《飛氈》與董啟章的《地圖集》〉，《素葉文學》，第68期（2002年12月），第57 - 59頁。

陳孟君：〈地圖、神話與（偽）考古人類學：論董啟章小說想像城市歷史的路徑〉，《臺大中文學報》，第48期（2015年3月），第161 - 214頁。

陳婉秋：〈歷史重構，身份追尋——論董啟章《地圖集》與《V城繁勝錄》體現的香港本土意識〉（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專題研究》論文，2002年）。

翁婉君：〈董啟章的城市創作觀與書寫實踐〉（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2年）。

張娟芬：〈與男同志錯身：評董啟章《雙身》〉，《聯合文學》（95年2月），第128 - 133頁。

張雅雯：《尋求女性主體意識：以麥可康寧漢〈時時刻刻〉及董啟章〈安卓珍妮：一個不存在的物种的進化史〉為例》（台北：東吳大學英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許維賢：〈黑騎士的戀物／（歷史）唯物癖：董啟章論〉，《香港浸會大學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第 64 期（2007 年 6 月）。

鄒文律：《城市書寫：董啟章小說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課程哲學碩士論文，2006 年）。

鄒文律：〈人與物件的時光之旅——論董啟章《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的物（家）史書寫〉，《政大中文學報》，第 16 期（2011 年 12 月），第 231 - 268 頁。

鄒文律：〈論董啟章《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和《時間繁史·啞瓷之光》對作家倫理責任的叩問〉，《中國文學學報》，第 4 期（2013 年 12 月），第 161 - 187 頁。

黃念欣：〈另類的校園愛學——談《紀念冊》與《小冬校園》〉，《讀書人》，第 9 期（1995 年 11 月），第 27 - 30 頁。

黃彩政：〈董啟章小說敘事結構研究〉（臺北：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6 年）。

黃雅婷：〈論董啟章《雙身》及《體育時期》的身體書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專題研究》論文，2005 年）。

廖偉棠：〈從拜物者的烏托邦走向可能世界——評董啟章長篇小說《天工開物·栩栩如真》〉，《香港文學》，第 258 期（2006 年 6 月），第 41 - 43 頁。

劉象愚、楊恆達、曾艷兵：《從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劉鳳鸞：〈另一個《叮噹》裡的大雄？——談董啟章《小冬校園》裡的小冬〉，《滄浪》，第 17 / 18 期合刊（1996 年 7 月），第 106 - 109 頁。

關夢南：〈讀董啟章的《家課冊》——兼說〈校園小說〉及其他〉，《讀書人》，第 20 期（1996 年 10 月），第 50 - 52 頁。

4. 作者訪談

吳美筠：〈後反送中時期，香港人的語言怎樣走下去 ——董啟章訪談錄（上）〉，《香港文學評論》，載於 <https://www.literaturehk.com/920931040143/2019/7/16/>。

柯文君：〈董啟章：今次寫科幻小說(16:00)〉，《明報文學版》，2018 年 7 月 8 日。

許維賢：〈一條不能失守的戰線——跨界走訪董啟章〉，《蕉風》，第 498 期（2007 年 7 月），第 100 - 109 頁。

5. 網上文獻

丘庭傑：〈「寫不寫之寫」的可能——讀董啟章《神》〉，《香港文學》，第 394 期，（2017 年 10 月），載於 <http://www.hongkongliterary.com/dzdetail.jsp?id=9402&pid=34460137&dzid=50445657&nav=1>。

吳芷寧：〈「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讀董啟章《神》〉，《文學香港》（2018年9月），載於 <https://www.literaturehk.com/2018/2018/9/10/-#>。

楊焯灝：〈論董啟章《愛妻》（二之一）：淫書癖與評論人：由「葉靈鳳機器」說起〉，《SAMPLEX 微批文學媒體計劃》（2018年9月），載於 <https://paratext.hk/?p=1572>。